□文学聚焦

传记文学：在场的『中国故事』

李炳银

传记文学在中国起步很早

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在其文史分类上，人们一直是将其视为历史书写作品的。但是，《史记》中的“本纪”“列传”部分，已经具有很分明的人物传记特点了。所以也有人将这些部分看成文学作品对待。自然，在人们还没有建立传记文学概念的时候，这些作品的传记特点似乎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和研究。司马迁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肯定也不会有传记文学的追求。但在真实性和文学性的表达方面，司马迁事实上为中国传记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原则和榜样。

传记文学在中国虽然起步很早，可中国的传记文学并不很发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先生就对中国传记文学不很发达的局面表示了不满，认为中国的很多等级、禁忌、名讳要求，严重地局限了传记文学的发展。传记文学是围绕着真实的人物经历事迹进行生动艺术表达的一种文体。传记文学对于生活真实内容的传递、表现不同的社会人生，是沟通联系人物与社会历史文化等丰富内容的很好渠道。因此，优秀的传记文学，既可以与历史实现很好的贯通，也可以与文学实现美妙的融合。传记文学是一种个性化表现人类社会人生内容的文学方式，也是因为提供了非常生动的人物形象事迹故事而对读者产生有力的感染催动作用的文化对象。

此前，在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推进和实践过程中，朱东润先生贡献突出。他的《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元好问传》等，在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影响。另外还有像吴晗的《朱元璋传》等，也是人们看重的传记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也出现了一些英模人物传记，但为数不是很多。和其他文体相比，传记文学创作还是一个弱项。在西方社会，传记文学历来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或许相传为荷马所作的《伊利亚特》中，就已经开始了类似传记这样的表达。后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了“伟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他希望通过对这些“伟人”人生事迹的真实描绘，说明这些伟人也都难免厄运，但是由于他们有高尚的品性，终究成了真正的伟人，从而给不幸的人们以安慰和勇气。在罗曼·罗兰前后还有像彼埃尔·贝勒、詹姆斯·鲍斯威尔、莫洛亚、欧文·斯通等不少著名传记写作家。传记文学时常在开拓思想精神和弘扬文明进步情感行为方面，在彰显杰出人物、英雄形象方面表现突出，十分富有对人的实际激励撼动力量。

积极推动传记文学发展，既是文学创作活动的有效途径，也是借助传记文学这种形式倡导和促进社会健康思想精神、道德情感及行为的很好实践。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中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也已经开始了新的进程。传记文学写作的框限已经打开，过去只有领袖人物才可以叙述的藩篱基本破除；各种各样的禁忌也似乎减少了很多，作家在对人物经历事迹的描述中，可以更加接近现场和真实；传记书写的方式也明显地多样化起来了。

当代传记文学富有社会内容蕴含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真正解放，是自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伴随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逐步展开的。这之后出现的像《彭德怀自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真实地书写人物坎坷曲折经历命运的作品，既是著名人物的人生表述，又是很富有社会内容蕴含的传记作品。这些年间，陆续出过很多将帅和各种现代名人传记作品，使得传记文学创作出现了令人欣慰的景象。如果更多地从真实性和文学性方面来选择的话，此后很多以报告文学名世的作品，都带有传记作品的特点。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痴情》、徐刚的《黄河万里独行客》、李春雷的《木棉花开》、钟法权的《陈独秀江津晚歌》、丰收的《镇边将军张仲翰》、邢军纪的《最后的大师》、禹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施昌学的《海军司令刘华清》、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等，就是这样从某一个角度进入，对人物的主要经历事迹给予的文学书写。这些作品都是十分富有社会历史内容包含的作品，对于人们接触人物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都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是很好的传达中国社会环境和人们生活故事的作品。例如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就在较短的篇幅内，集中地书写了任仲夷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如何承担着来自上下的各种压力，坚持解放思想，坚决推进改革开放的艰难情形。作品在人物最精彩的人生华章展开中，又巧妙地将笔墨延伸到他的历史经历事迹描写，在短小的篇幅中实现了对人物全面重点关照，几乎有些《史记》中“本纪”那样的传记特点；像邢军纪的《最后的大师》，作者用10年时间追踪历史，将叶企孙这个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奠基者，扶植培养了几乎多半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科学家的人的坎坷艰辛人生和悲剧命运给予了深情的描述表达，非常令人感慨和唏嘘！像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作者以自己的人生曲折经历，书写了自己如何在中国这个社会生活环境坚忍不拔，努力奋斗，终于由一个出生在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村，只读5年书的乡下女孩，经历多次几乎难以超脱的危机关口，如今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的生动情形等。而像有关钱学森、袁隆平、杨善洲、罗阳等科学家、先进模范人物及一些当代成功企业家的传记作品，都是从传记文学这个渠道传递中国很多立志报国、忠诚信仰、无私奉献故事。很多人物的传记作品，是中国真实社会生活的有机部分，因为这样一个个真实人物命运故事的文学存在，中国故事也显得非常的确实和个性丰富，具有很强的历史现实认识感受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用传记方式表达

自2012年开始，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国家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更是一项面对新的现实文化环境开展的旨在用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书写，文学生动地表现众多的中国文化才俊人物和他们璀璨杰出的文化创造成果的重大文化建设活动。在社会生活日益物质化和情绪浮躁的当下，对于真正富含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特点的成果，用传记书写的方式给予聚集和表达，这对于很多出于功利目的，人为制造轰动效果，令人忧虑的轻侮中国历史，戏说、胡说中国历史的芜杂现象也会有一种积极的排除和纠正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的表现，基本是由这个社会中的人物行动表现而产生效果作用的。因此，在某种意义和角度来看，社会的历史就是各种人物行为活动结果的历史。在记录和传递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内容的过程中，传记写作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书写表达途径。如今的各种人物传记书写，就正在承担着真实生动地讲好中国现实故事的作用，殷切地期望传记文学创作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图片来自网络

□作家近况

陈世旭：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

宋　庄

陈世旭

世界上有两种作家，一种更多的是文学受惠于他们，一种更多的是他们受惠于文学。前一种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光荣，使文学成为人类文化中宏伟辉煌的殿堂。后一种则从文学中获得无穷的好处。文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际遇，文学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人生支柱，是他们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他们应该对文学感激涕零。

陈世旭说，自己属于后者。“我写作着，我生活着，这就够了”，这句话写在陈世旭一个自选集的扉页上，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一种人生定位。

20世纪70年代，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惊涛》分获1979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8年，《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他曾是文坛风云人物，近年来也新书不断，当属宝刀不老。实际上他的写作始终伴随着争议和退稿；他所秉持的理念，与我们印象中的名家大相径庭。“先天才华和后天修养的缺失，让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无比的艰难。”陈世旭坦率地说，最初写过的十几个短篇，除了一两个在地方报刊发出，大多成了废纸。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写的《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前先后被两个刊物退稿。此后，获得1987—1988年全国优秀小说奖的《马车》，也曾是《人民文学》的退稿。

《小镇上的将军》把他卷进当时激荡喧嚣的文学漩流。那些年是文学的好日子，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而这恰恰是陈世旭在写作上最悲惨的时候。被调回省城专业写作的他一片茫然，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好不容易憋出的文字，被一再退稿，偶尔发出一两篇，只能是让人失望。

1980年春，对青年作者怀有莫大热望的著名评论家冯牧在一个座谈会上忽然提到陈世旭的名字，说有人告诉他，陈世旭在《小镇上的将军》之后写的作品都不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也因此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清醒。”陈世旭说。他奉为写作圭臬的是两句话：其一，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其二，写作就是用最畅晓的语言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尽可能多的人（大意）。前一句是冯梦龙说的，后一句是托尔斯泰说的。

1998年，《镇长之死》获首届鲁奖，陈世旭却没有参加颁奖盛典。《镇长之死》是对《小镇上的将军》写作反思的一个结果。他希望摆脱之前人物塑造的扁平化。有没有实现这个想法他自己并无把握。

而今，陈世旭快写一辈子短篇了，退稿依旧是常事。2015年和2016年发表的短篇《花·时间》和《欢笑夏侯》都分别是《收获》和《人民文学》的退稿。编辑部不到觉得实在不堪决不会退自己约的稿。虽然可以拿取舍眼光不一来安慰自己，但也说明作品没有达到公认的水准。他把这些记得一清二楚，就是为了警醒自己永远别嘚瑟。“所有这一类评价一定程度上对我是一种激励，逼我在写每一个下一部作品时都尽力而为，去争取更多的认可。”

陈世旭很少写长篇，2014年出版的《孤独的绝唱——八大山人传》（作家出版社）是史上唯一一本书写八大山人的长篇传记。他在现存不多的关于八大山人的史料记载中，用自己的文学想象和大量相关历史资料，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八大山人形象。

在2017年的新作《马车》（文化发展出版社）中，收入了陈世旭的五个中篇小说代表作，其中的《青藏手记》，是他少有的以井喷之势写就的力作。

在同时代的写作者中，陈世旭从来没有过“文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之类的高峰体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总在找米下锅。“在我写作最枯竭的时候，王安忆建议我打破惰性，去感受一些异质性的生活，比如去青藏看看。”后来陈世旭还真得到一个机会，去青海采访上世纪50年代援青的内地人，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他常常天亮前动身，穿过沙漠、戈壁、荒原，到达目的地已近半夜，那些接受采访的人已经等了一整天。面对一屋子“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花白头发，他忍不住泪奔。太多的故事来不及记录，回到江西正好是国庆长假，陈世旭就在那些天里一口气写了3万多字的中篇《青藏手记》，随即给了《人民文学》，很快就发到头题。但正赶上文坛流行“反崇高”“取消意义”“零度情感”，这种题材自然是运交华盖。有位评论家说，陈世旭的写作像一壶水烧了半天只听见响，就是老也不开。

“西西弗斯之役，看来是我的宿命。”他自嘲地说，“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门可以聊补生计的手艺，再多点，就是满足爱好。我从来认定平淡、平庸、平静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陈世旭有一篇文章，叫做《平庸的写作和平庸的快乐》，被转载多次。他说，与其巴望那些虚幻的美梦，不如踏踏实实尽力把自己做到最好。这样的庸人主义不值得提倡，但他觉得做人做事还是实在些好。

□作家谈

“扶不扶”的道德境遇

卫建民

小品《扶不扶》，用城市里常见的生活场景，以滑稽、搞笑的喜剧形式，向观众提出一个道德话题。这个节目的编创，小中见大，把俗提升为雅，转轻松为严肃，是健康向上、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扶不扶”的现象。由于社会风气的变化——我们也不必说人心不古；举手之劳，有时颇费踌躇：假如被扶者以怨报德，嫁祸于我怎么办？——《扶不扶》的情节，就在这种彼此心思不同的误解中展开。其实，当我们对生活中的小事进入要判断的阶段时，已经显现了社会病。“判断”的思维过程，导致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焦虑和痛苦。在地铁车厢，在地铁出入口，上班族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男一女，男的手持麦克唱歌，女的背一个小孩专司收钱。你每天都遇到这样的流动式家庭文艺小团队，你会每天伸出援助之手吗？如果你不掏钱，妇女和她背上的小孩已在考验你的“不忍之心”，而唱歌的男性已给你提供了服务，怎么办？到你出了地铁，在出口台阶上，每天都有几个职业乞丐在作揖磕头。他们营养充足，红光满面，膝盖下垫着厚厚的棉垫——有完善的“劳保设施”；看到这个天天相遇的城市风景，你还会再掏一次钱，连续表示爱心吗？——这都是《扶不扶》提出的道德话题和对人心的测试，也属于“善恶”的哲学范畴。

在先秦哲学史里，孟子和荀子早就提出“善”与“恶”的命题。孟子主张“人性善”，并以“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假设来证明他的主张。荀子认为“人性恶”，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这两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观察点不同，只是所操之术各异，本质上都是让人走向为善之路。孟子是让人尽性发挥人固有的善，也就是《孟子》里著名的“四端”；荀子是要以“礼”、以外部的强制力量控制人无限的欲望。在人格修养的道路上，他们是殊途同归。

天性善良的人，看到不幸的人和事，自然生发恻隐之心，并会伸出援助之手，但有些社会现象，比如健康的正常人专业乞讨，有关机构则应劝阻，教育他们要以诚实的劳动求生存，不能让变态的事成为常态。我们不能讥笑这些人，滋长他们的对立情绪。我们也不能冷漠，对不和谐的音调充耳不闻。至于在公共场合相互帮助，做事说话想想他人的感受，“扶不扶”不再成为问题，都应是文明社会本该有的正常现象。在车站、银行、住宅区和所有公共场合，治安管理部门，不必过多地宣传广播“不要把行李交给不认识的人”、“不要接陌生人的电话”“不要……”什么，常年强烈地制造人与人不信任的气氛——虽然他们的用意是好的。

戏剧小品，要在几十分钟里赢得观众的喜欢，谈何容易！假如在赢得观众笑声的同时还能提出严肃的思考，那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虽小道，亦有可观焉”。《扶不扶》做到了这一点，受到观众长久地喜爱。我认为，越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就越是要考虑受众的正向感受，因为一切文艺作品，都具备辅助社会教育的功能。笑，不仅仅是生理心理反应，更是作品的社会效果。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

李白《鲁东门泛舟》诗二首其一赏析

钟振振

日落沙明天倒开，
波摇石动水萦回。
轻舟泛月寻溪转，
疑是山阴雪后来。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前后，李白移家兖州（狭义的兖州，即今山东济宁市兖州区）。诗题中的“鲁”，即兖州的别称。兖州下辖曲阜县，曾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国都。州城之东有泗水，诗人此番“泛舟”而游者，应当就是这条河。

“泛舟”之始，是“日落”时分。水边沙滩，反射落日之光，明亮耀眼。这是逆光下所见的景象。“天倒开”，写“天”在水中的倒影。“萦回”，形容河水弯环曲折。弯环曲折的河水激石而掀波，原本是石不动而水动，如实写来，便平淡无奇；写作“波摇石动”，水石俱动，夸张了水流的湍急，则精警异常。舟泛移时，由日落而至月升。原本是船在月光下行驶，如实写来，亦平淡无奇；写作“轻舟泛月”，不惟行文简洁，而且可以引申出船在月亮上行驶的歧义，诱导读者眼前浮现别一妙境，亦精警异常。“寻溪转”，即随着河水流转。“溪”，泛指水面狭窄的河流。“转”字照映上文的“萦回”，可见李白之诗不仅长于大处落墨，也有针缕细密的另一面。

以上三句皆从正面用直笔写“泛舟”，末句则拈出一个诗意盎然的典故，改从侧面用曲笔来写“泛舟”。《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东晋名士王徽之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有天夜里下大雪，他一觉醒来，开门酌酒赏雪，四望皎然，忽然想念住在剡县（今浙江嵊州）的友人戴逵，于是连夜乘小船去寻访。同是“泛舟”，虽有雪夜与月夜之别，但雪光皎洁，月光亦皎洁，则“兖州月下来”也就顺理成章地“疑是山阴雪后来”了。月夜泛舟，已显现其幽美；有意“错觉”为雪夜泛舟，则倍增其幽美：二者皆可分别入画，而二者的瞬间切换与影像叠加，却非图画之所能。诗人与画家的对决，“诗中有画”，仅是平手；只有像李白这样，做到“诗倍于画”，才能更胜一筹。

“有意”制造出来的“错觉”，在李白此诗中不止见于末句。若首句之“天倒开”，次句之“波摇石动”，第三句之“轻舟泛月”，亦属此类。诗人娴熟地运用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更灵动、更奇幻地写活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扫描可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